

刘少奇外交思想与实践研究 (1949—1966)

LIUSHAOQI WAJIAO SIXIANG YU 肖 娴 著
SHIJIAN YANJIU (1949—1966)

刘少奇外交思想与实践研究 (1949-1966)

LIUSHAOQI WAIJIAO SIXIANG YU
SHIJIAN YANJIU (1949-196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少奇外交思想与实践研究(1949—1966)/肖娴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161-3483-2

I. ①刘… II. ①肖… III. ①刘少奇(1898—1969) - 外交理论 - 思想评论 IV. ①D8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200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5
插 页 2
字 数 221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1)
第二节 国内外刘少奇外交思想研究现状评述	(5)
第三节 研究内容、框架和研究方法	(10)
第一章 刘少奇外交思想的理论基础和重要来源	(14)
第一节 刘少奇外交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14)
第二节 刘少奇外交思想形成的文化根源	(23)
第三节 刘少奇外交思想形成的时代条件	(26)
第四节 刘少奇外交思想形成的历史根据	(29)
第二章 1944—1966 年中共中央外交机构和决策体制	(34)
第一节 1944—1966 年中共中央外交机构的变迁	(34)
第二节 1949—1966 年中共中央外交决策中的“毛—刘—周” 体制	(38)
第三节 “毛—刘—周”决策体制的特点与刘少奇的个性 特征	(41)
第四节 “毛—刘—周”体制下刘少奇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	(45)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对国际政治和新中国和平外交的 理论思考	(51)
第一节 在和平与战争矛盾判断的基础上推动新中国的 和平外交	(51)

第二节	以和平共处原则为基础推动新中国的和平外交	(57)
第三节	在“世界革命”时代主题认识基础上推动新 中国和平外交	(62)
第四章	刘少奇与中苏同盟关系的确立	(68)
第一节	《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与中苏同盟确立的 理论基础	(68)
第二节	刘少奇 1949 年秘密访问苏联与中苏同盟确立的 政治基础	(73)
第三节	中苏友好协会与中苏同盟确立的社会基础	(82)
第五章	刘少奇与新中国的周边外交	(91)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后刘少奇的“亚洲革命”思想	(91)
第二节	刘少奇与 1950—1954 年新中国的援越政策	(99)
第三节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刘少奇睦邻和平的周边外交 思想	(118)
第四节	1963 年刘少奇对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和 越南的访问	(123)
第五节	1966 年刘少奇对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的 访问	(134)
第六章	刘少奇与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	(143)
第一节	政党外交是新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143)
第二节	刘少奇与波匈事件危机的处理	(148)
第三节	中苏论战前后刘少奇的政党外交思想与实践	(162)
第四节	与非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广泛接触	(177)
第七章	刘少奇外交思想的历史特点和时代价值	(182)
第一节	刘少奇外交思想的历史特点	(182)
第二节	刘少奇的时代主题观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和世界 关系的认识	(196)

第三节	刘少奇的和平外交思想与当代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200)
第四节	刘少奇的周边外交思想与当代中国的周边外交	(205)
第五节	刘少奇的政党外交思想与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	(207)
结论		(210)
参考文献		(212)
后记		(224)

绪 论

刘少奇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政治家，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卓越领导人，但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所蒙受的冤屈，理论界对刘少奇思想和实践的研究起步比较晚。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的外交思想和实践一直没有引起人们充分的重视和研究。事实上，刘少奇在新中国外交舞台上发挥了独特和重要的历史作用，刘少奇的外交思想和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外交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全面深入研究1949—1966年刘少奇的外交思想和实践，对于深化刘少奇思想、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史的研究以及推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有重要的理论、历史和现实意义。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1980年2月29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决议”指出：“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几十年来，他作为党和国家卓越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我党的建设，对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① 这既还原了刘少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3页。

奇本来的历史面貌，同时也为从各个方面推动刘少奇思想和实践研究的起步、深化和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从1980年以来至今的30多年中，关于刘少奇思想和实践的研究不断发展，特别是在刘少奇的党建思想、刘少奇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刘少奇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等方面，研究文献不断丰富、研究成果不断厚实、研究影响也不断扩大。不过，与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对刘少奇外交思想和实践的研究总体上比较薄弱。从对刘少奇研究的学术史来看，1998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1998年后，在刘少奇研究整体水平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刘少奇在外交方面的思想和实践问题开始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学术界关于刘少奇外交思想和实践的研究成果也开始多了起来，构成了最近十多年来刘少奇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以及新中国外交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问题。1998年后，关于刘少奇的外交思想和实践的研究能够不断发展，主要是下面三个因素推动的结果：

第一，党的领导人为刘少奇外交思想和实践的研究指明了方向。1998年11月，江泽民在刘少奇诞辰100周年的讲话中在高度评价刘少奇的历史地位时指出：“刘少奇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建树了卓著的功勋。”^①这是在党的重要理论文献中第一次把外交与其他方面的工作并列起来，作为刘少奇对新中国发展的突出贡献之一。江泽民的这一讲话在刘少奇思想研究史上有重要的政治和理论意义，是对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关于刘少奇历史和政治地位认识的继承和新的发展。2008年11月，胡锦涛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高度评价刘少奇对新中国建立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功绩时，进一步具体地指出：“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指刘少奇——引者注）率领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为建立新中国争取了有力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②虽然江泽民和胡锦涛的这两个讲话在评价刘少奇外交思想和实践的具体着眼点

^① 江泽民：《在刘少奇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8年11月20日。

^② 胡锦涛：《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11月12日。

不同,但二者都积极肯定了刘少奇对新中国外交的重大贡献,这就为理论界深入开展关于刘少奇外交思想和实践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第二,关于刘少奇研究的文献材料不断挖掘、充实与丰富。1998年之前,关于刘少奇的研究资料和文献主要是两卷本的《刘少奇选集》、《刘少奇年谱》、一些关于刘少奇研究的专题资料和文集^①以及老一代人的有关回忆资料和口述文献。1998年刘少奇诞辰100周年后,关于刘少奇的研究资料和文献进一步丰富,逐步趋向齐整和完善。特别重要的是,1998年后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刘少奇传》以及《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1—7卷)。另外,随着中共党史、新中国史研究的其他方面的文献资料的更加丰富,以及中国外交部档案馆相关档案资料文献的公开,这些都为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各个方面进一步推进关于刘少奇思想的研究提供了基础,也为加强和深化刘少奇与新中国外交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相应的较好的文献基础。

第三,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20世纪90年代后,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发展趋势越来越鲜明,“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②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要继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必须要不懈地为当代中国的发展创造一个持久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必须要“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③为此,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准确判断世界政治的发展和时代方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入研究包括刘少奇在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期观察和研究国际政治过程中所形成的世界眼光以及在长期领导和开拓新中国外交事业过程中留下的宝贵思想财富,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发展,尤其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统筹国际发

① 主要是1987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分别在1991年和1993年出版的《刘少奇论党的建设》和《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三本专题文集。

②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③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展和国内发展对党的历史和理论研究提出的迫切的现实需要。

二、研究意义

本书着眼于1949—1966年新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所处的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以及对外交往中的重大问题,通过梳理文献资料和借鉴现有的研究成果,力图全面系统地研究从1949—1966年期间,刘少奇对新中国外交方面重大活动的决策、参与以及刘少奇的外交思想,以此来推动刘少奇研究、新中国外交史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史研究的深入。这一研究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一,这一研究有利于拓展刘少奇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视角,从而推动刘少奇研究的深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刘少奇的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但总的来说,正如著名的刘少奇研究专家黄峥所说的,“目前对刘少奇的研究、宣传,同党中央的要求、人民的期望、社会的需要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①这种差距既包含研究的深度,也包含研究的广度。因此,系统全面地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的外交思想和实践,对于深化关于刘少奇研究的深度,拓展关于刘少奇研究的广度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第二,这一研究能够深化对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和实践以及新中国外交史的研究。目前,关于新中国外交史的研究,主要以毛泽东、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实践为主,关于刘少奇在新中国外交史上的地位,目前的研究中很少有人涉及。事实上,刘少奇作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参与、指导了新中国许多重大的外交活动,为巩固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保障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国际和平环境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因此,加强对刘少奇外交思想和实践的研究,对于推进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和实践以及新中国外交史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第三,通过对刘少奇外交思想和实践的系统研究,能够深入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外交事业的基本经验以及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外交思想的基本特点,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时

^① 黄峥:《刘少奇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30页。

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当前中国外交的路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外交的发展和继承。在长期的新中国历史中,我党在外交理论改革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着深刻的教训,深入挖掘刘少奇的外交思想和实践,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时代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此外,在社会层面上说,由于“群众对刘少奇这个人物,很想了解。这是一种社会需要,是一个市场。”^①从群众的这种需求来说,深入研究刘少奇外交思想和实践,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和传播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外交事业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节 国内外刘少奇外交思想研究现状评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至今,国内理论界关于刘少奇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但关于刘少奇外交思想和实践的研究,总体上非常薄弱^②。近十多年来,随着有关刘少奇的文献资料以及相关档案资料的结集出版,刘少奇研究的领域和视角不断深化,关于刘少奇的外交思想和实践也逐渐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理论重视和学术上的兴趣。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关于刘少奇外交思想和实践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刘少奇外交活动和思想的整体研究

在这方面,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刘少奇传》作出了开

① 黄峥:《刘少奇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30页。

② 比如陈君联《刘少奇的思想理论研究》(1988年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缅怀刘少奇》(1988年版)、《刘少奇研究论文集》(1989年版)、《刘少奇与新中国建设》(1994年版),陈绍畴主编《刘少奇研究评述》(1997年版),以及黄峥《刘少奇研究》(2008年版)、《刘少奇一生》(2003年版),董一冰《刘少奇社会主义思想研究》(2007年版),吕斗星编《刘少奇和他的事业》(1991年版)等刘少奇研究中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中,基本上都没有涉及刘少奇的外交思想和实践。人们在对老一辈革命家的研究和认识中,也很少把刘少奇与新中国的外交联系起来。不过,其中也有一些关于刘少奇从事外交活动的回忆资料和研究,比如师哲《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夜》、罗贵波《少奇同志派我出使越南》(两文都载《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戴秉国《试论刘少奇党际关系思想与实践》,见《刘少奇百周年纪念——全国刘少奇生平 and 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拓性、代表性的贡献。《刘少奇传》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访苏的具体经过、刘少奇在担任国家主席后对中苏争论的参与以及20世纪60年代刘少奇作为“和平的使者”对东南亚国家外交访问所取得的重要成果,这是改革开放后刘少奇研究中第一次比较系统全面地涉及刘少奇的外交活动和基本思想,因而在刘少奇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张文和《走出国门的刘少奇》(2001年)一书,概述了刘少奇一生的出国经历,较为完整地记述了刘少奇的对外活动,认为刘少奇在这些外交活动中,“以他个人特有的个人魅力,理论家的思辨,外交家的风采,尽显中华民族泱泱大国之风,尽展中华民族襟怀宽广之情,为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架起了一座座友谊、友好之桥。”^①这是对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外交思想和实践非常高的评价。但这一著作带有很强的纪实性特征,因此在理论和历史研究的深度上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陷。张勤、朱超南在《简述刘少奇对我国国际交往事业的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一文中,从中苏关系的建立、中苏同盟的破裂、出访东南亚等方面,概述了刘少奇的外交活动,认为刘少奇的这些外交活动为新中国的建立、巩固与发展争取到了宝贵的外援,营造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周边环境,同时也很好地树立了新中国的国际形象,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捍卫世界和平,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正常交往,抵制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做法,推进国际工人运动健康发展作出了积极的重要贡献^②。蒋艳丽、肖志宗在《刘少奇对新中国的外交贡献》一文中,从中国和平外交、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国际反对殖民主义三个方面高度评价了刘少奇对新中国外交的贡献,认为刘少奇是和平外交政策的“积极倡导者和执行者”,是发展与社会主义各国关系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是国际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坚决支持者和战斗者”^③。章百家在《刘少奇与新中国外交事业》一文中,则围绕着《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1—7册的出版,从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支持亚洲各国革命、中越

① 张文和:《走出国门的刘少奇》前言,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② 张勤、朱超南:《简述刘少奇对我国国际交往事业的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1期。

③ 蒋艳丽、肖志宗:《刘少奇对新中国的外交贡献》,《湖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关系、中共与兄弟党的关系等方面,分析了刘少奇对新中国外交事业的重大贡献^①。该文虽然篇幅短但却提纲挈领地、大跨度地全面分析了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外交思想研究的主要方面和主要着眼点,并列举了刘少奇外交思想和实践研究中一些重要的文献资料,因而具有比较重要的学术意义。

二、关于刘少奇 1949 年访苏问题研究

代表性的成果有:《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一次披露了 1949 年刘少奇访苏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此后这方面的文献材料和研究开始逐步得到了加强。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②一书中回忆和介绍了 1949 年和 1952 年两次随刘少奇赴苏联访问的情况,以口述资料的方式充实了关于这一时期刘少奇外交思想和活动研究的史料。沈志华在《关于刘少奇 1949 年访苏的俄国档案文献》(《党史研究资料》1998 年第 2 期)中翻译和介绍了一批重要的档案文献资料。《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关于刘少奇 1949 年访问苏联的档案资料则进一步丰富了关于刘少奇访苏研究的文献材料,从而为深化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基础。在相关回忆和新档案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对于中苏同盟确立中刘少奇的作用进行了研究,比如,张飞虹《刘少奇 1949 年秘密访苏与中苏结盟》一文中,从介绍新中国建国方案、介绍中国革命经验、落实苏联援华项目、传达中共关于处理中苏关系的原则性意见、处理 1945 年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五个方面分析研究了刘少奇在中苏同盟关系的确立中的重要作用^③。任晓伟在《建国前夕刘少奇对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思考——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考述》一文中,则围绕着新中国成立

① 章百家:《刘少奇与新中国外交事业》,《刘少奇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24—126 页。

② 除此之外,还包括后来的《我的一生——师哲回忆录》(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和《毛泽东的翻译师哲眼中的高层人物》(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学术界对师哲回忆的一些具体内容是存在一些疑问的,关于这一问题可参见刘明钢、金敏求《师哲回忆录关于中苏关系的几点史实》,《档案天地》2010 年第 10 期。

③ 张飞虹:《刘少奇 1949 年秘密访苏与中苏结盟》,《苏州大学学报》1999 年第 1 期。

前后刘少奇对国内发展主要矛盾的思考,研究了访苏期间刘少奇对国内发展问题的思考^①。沈志华在《求之不易的会面: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的会谈与沟通》和《从西柏坡到莫斯科: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中,也涉及了对刘少奇1949年访苏问题的研究,而且在中国革命进程中中苏两党关系整体变化的框架下凸显出了刘少奇这次访苏的意义^②。

三、关于刘少奇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越援助研究

这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逐渐展开的一个重要问题。卓爱平、韩永要《刘少奇决策中国援越抗法》(《党史天地》1998年第1期)、牛军《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和主要特征》(《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杨奎松《新中国从援越抗法到争取印度支那和平解放的政策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等成果,比较早地在研究中涉及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越政策和援越外交中的重要作用,这对于扩展刘少奇外交思想和实践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些研究所依据的文献资源,主要是以相关口述和回忆文献为主,随着2005年后《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1—7册的陆续出版,新中国成立初期刘少奇在对越援助中的活动和作用的研究,也继续得到加强,有一定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是余湘《建国初期刘少奇对越援助的思想和实践》(《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3期)、张玫《试论建国初期中国的对越政策》(《安徽文学》2010年第1期)等,这些成果比较集中系统地探讨了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越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外交政策制定中的作用。

(4) 关于刘少奇外交思想的提炼和概括。在对刘少奇外交思想和实践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也尝试从不同角度对刘少奇外交思想的特点进行概括。比如,李景全在《刘少奇在开展中国外交中的经济谋略》一文中梳理了刘少奇外交活动中的经济思想,认为着眼于增强经济实力

① 任晓伟:《建国前夕刘少奇对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思考——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考述》,《党的文献》2007年第5期。

② 沈志华:《求之不易的会面: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的会谈与沟通》,《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沈志华:《从西柏坡到莫斯科: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4期。

是刘少奇外交活动中的重要内容和基本特点^①。戴秉国在《试论刘少奇党际关系思想与实践》一文中,则从各党之间的平等、相互尊重、独立自主等方面分析了刘少奇党际观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②。卢勇在《试论刘少奇的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一文中,把刘少奇的外交思想和活动放到国际统一战线的视角下来研究,关于刘少奇的外交思想,该文认为新中国外交的蓬勃发展,与刘少奇践行其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重要功劳是分不开的^③。

总体上看,上述研究对于人们从新中国外交层面来认识和研究刘少奇,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这种意义在于:首先,这些研究成果表明,对刘少奇外交思想和实践的研究已经成为刘少奇研究、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史和新中国早期外交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其次,这些研究成果,分别基于不同视角、运用不同方法对刘少奇的外交思想和实践进行研究,从而提升了人们对刘少奇在新中国外交中重要作用的认识,并且为更加系统和更加全面地研究刘少奇的外交思想和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成果基础。

不过,与对刘少奇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目前关于刘少奇外交思想和实践的研究不仅在整個刘少奇研究中所占的分量比较小^④,而且整个来说,主要是以记述、材料的梳理为主,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远远不够^⑤。目前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是:

一、对1949—1966年这一时期中国外交史上刘少奇的活动和作用,还缺少一贯的系统梳理和研究。目前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某一个具体问题或某一个特定历史阶段来研究刘少奇的外交思想和实践,而对于刘少奇外交思想和活动与新中国外交的整体走向关系的研究不够深入。

① 李景全:《刘少奇在开展中国外交中的经济谋略》,《外交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

② 戴秉国:《试论刘少奇党际关系思想与实践》,《高校理论战线》1999年第1期。

③ 卢勇:《试论刘少奇的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毛泽东思想研究》2009年第6期。

④ 从近几年关于刘少奇的研究进展来看,一些重要成果也基本上没有涉及刘少奇的外交思想和活动,可参见董一冰《刘少奇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从一些关于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的重要研究成果来看,在对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的研究中,也很少涉及刘少奇的外交思想和活动,关于这一点可参见刘鹏飞《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杨洁勉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与实践》,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

⑤ 关于刘少奇外交活动和思想研究的现状及其述评,另可参见张飞虹《刘少奇外交活动与思想研究述评》,《党的文献》2011年第1期。

二、对刘少奇在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共中央外交决策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刘少奇关于时代发展认识的研究以及对其外交思想的概括和现实意义的阐发,目前的研究中基本上处于空白,研究成果很少,因此也就没有能够在总体上勾勒出刘少奇在新中国外交史上的地位和所起的重要作用。

三、一些重要的问题,虽然在目前的研究中已经有比较多的涉及,但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化。比如,关于刘少奇在中苏同盟关系确立中所作出的理论贡献以及对中苏同盟关系确立的社会基础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在目前的研究中还很少涉及。另外,关于刘少奇与20世纪50年代亚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①、中苏论战中刘少奇的活动及其评价、刘少奇的政党外交思想和实践等问题,还缺少相应的文献挖掘和深入研究。

国外学者对刘少奇外交思想和实践并无专门的研究。美国学者迪特默的《刘少奇》(1974年)作为国外学者研究刘少奇思想生平的一部专著,没有注意到刘少奇对新中国外交的贡献^②。一些国外学者,如俄国学者列多夫斯基在《米高杨秘密使华》、《刘少奇率团秘访莫斯科》等专题性研究中对刘少奇的外交活动也有一些研究,并披露了俄国的一些相关档案文献^③,但与国外学者对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研究相比,对刘少奇的研究还是非常薄弱的。

总的来说,目前关于刘少奇外交思想和活动的研究,与刘少奇在新中国外交战线上所起的重大作用是不相符合的。

第三节 研究内容、框架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内容和框架

本书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通过对档案文献和相关学术

① 目前这方面也有一些研究,比如陈宇、王家宠、钱大东等《刘少奇对国际工运和中国工会国际活动的历史性贡献》(载《中国工运》1998年第12期)。但这些研究总体上比较空泛,没有涉及刘少奇这一时期对亚洲革命发展战略的认识及其对新中国建立初期外交政策的影响等问题。

② 参[美]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传》,萧耀先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③ 参[俄]A. M. 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47—87、93—131页。

资料的系统梳理,以新中国外交史上的重大问题为线索,力图全面研究和分析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①刘少奇的外交活动。在此基础上,系统总结刘少奇外交思想的基本特征及其对于当代中国外交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时代价值。

具体地说,除了绪论和结论外,本书的主体研究内容包括以下七个部分:

一是刘少奇外交思想的理论基础和重要来源。这一部分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中关于时代本质的认识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学说中所涵盖的关于时代主题的判断、革命与战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党际关系、和平共处、新型国际政治形态等问题的认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美苏冷战的国际环境所形成的时代特征以及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三个特定阶段里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和实践等方面,分析了新中国建立后刘少奇外交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和重要来源。

二是1944—1966年中共中央外交机构、决策机制与刘少奇作用的考察。这一部分在分析1944年以后中共中央外交机构变迁的基础上,着重研究了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外交决策中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体制以及这一体制的基本特点、这一体制下刘少奇的个性特点,并以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为例,具体分析了在这一体制中,刘少奇对于新中国外交的重大决策性作用,以此来从宏观上把握刘少奇在新中国外交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三是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对国际政治和新中国和平外交的理论思考。这一部分主要以1955年刘少奇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以及1963年在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三篇重要文献为依据,研究了新中国建立后刘少奇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并揭示了在新中国不同发展阶段上刘少奇对新中国和平外交的具体思考。

四是刘少奇与中苏国家同盟关系的确立。这一部分主要从新中国建

^① 1966年6月11日,刘少奇与周恩来、邓小平一起会见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这是刘少奇生前最后一次会见党的外宾。1966年8月5日,刘少奇会见了赞比亚工商部长钦巴率领的赞比亚友好代表团,这是刘少奇最后一次会见国家的外宾,也是刘少奇最后的外交活动。